

# 從《說文新義》到《字統》— 論白川靜的漢字學研究\*

黃庭頌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擬從學術史角度切入，以漢字學研究為目標，分析白川靜《說文新義》及《字統》兩部著作，探討其編纂理念、體例架構以及價值影響。藉由觀察域外漢學家的思考歷程，突顯漢字研究的不同途徑與特色，為東亞漢學研究提供新的觀察視角。

本文主要研究課題有三：首先，分析《說文新義》與《字統》兩部著作的編纂理念、撰著特色，白川靜曾指出《字統》之撰著是在《說文新義》基礎下完成，而前者又對後者進行修改增補，故本文將通過比較，分析兩部著作所呈現的不同研究成果。其次，分析《說文新義》與《字統》的釋字差異。由於白川靜視《字統》為字書而非字典，故多收錄個人學術新見，而本文將比較白川靜在兩部著作的解釋觀點，檢討其漢字說解及系列字問題，亦考察白川靜的漢字學研究是如何形成。最後，本文檢討過往學界對其漢字理論之評價，亦思考日本漢學家的漢字研究成果。希冀藉由本文的分析，重新思考日本漢學家對漢字研究之意義與貢獻。

## 關鍵詞：

白川靜、說文新義、字統、漢字、漢學

## 壹、前言

白川靜（1910-2006）為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以甲骨文、金文及中國上古史研究見長，尤其對漢字形體源流著力甚深，更由此發展出一套頗具特色的漢字字源

---

\* 本文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8-2410-H-004-221-補助，特致謝忱。

學說。白川靜從小受到日本的語源、語法學著作影響，深獲大槻文彥《言海》、荻生徂萊《訓譯示蒙》及《譯文荃蹄》等書之啟發。<sup>1</sup>後又因大型辭典編纂的盛行，日本、中國分別陸續出版《漢和大辭典》、《字源》、《辭源》、《漢語大辭典》等工具書，<sup>2</sup>得以開始系統地思考漢字的字源問題。其論著涉及漢字討論者亦不少，其中以《說文新義》及《字統》、《字訓》、《字通》三部字書最為著名。

白川靜曾明確表示，其完成《說文新義》後，已經充分掌握漢字研究的關鍵，因此預計花費十年時間完成三部字書，而第一部即是以探討文字起源為目的的《字統》，<sup>3</sup>顯示兩書在釋字方面的關係密切。白冰也指出，《字統》的釋字內容與《說文新義》多有重複，然而兩書出版時間相距二十年，故前者較後者更顯成熟，且對《說文新義》之錯誤加以淘汰和更正。<sup>4</sup>據此論之，從《說文新證》到《字統》應可以窺見白川靜的漢字研究之發展脈絡及變化過程，是理解其學說相當重要之材料。

過往關於白川靜漢字研究的論著不多，臺灣方面幾乎未見，中國大陸方面則有劉海宇《白川靜《字統》「載書」文字學的譯介與研究》<sup>5</sup>、林源〈《字統》的體例和特點〉、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蘇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韓文娟〈從說「口」看白川靜的「說文觀」述評〉、連登崗〈白川靜「神聖漢字說」的失誤（一）〉等相關論文，<sup>6</sup>論述方式多以白川靜的研究成果為討論主題，同時再以大陸學界的主流觀點進行反思，最後糾正其學說。此法雖無不可，然較易忽略白川靜釋字過程之背景，對於其學說亦難以產生同情的理解。

有鑑於此，本文擬以《說文新義》及《字統》為研究對象，分析其編纂要旨及寫作目的，比較二書文字考釋的差異及變動，觀察作者提出之新說，藉此釐清白川靜漢字研究的發展過程。最後，本文將白川靜的研究成果放入歷史脈絡，爬梳相關評論，針對其學說進行反省及檢討。企圖從東亞漢學之視角，理解日本漢學家如何分析漢字，並對過往研究提出不同的詮釋。

<sup>1</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東京：平凡社，2011年），頁7-14。

<sup>2</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18-21。

<sup>3</sup> 白川靜：〈我的履歷書〉，《回思九十年》（東京：平凡社，2011年），頁68-69。

<sup>4</sup> 白冰：《青銅器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頁139。

<sup>5</sup> 劉海宇：《白川靜《字統》「載書」文字學的譯介與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sup>6</sup> 林源：〈《字統》的體例和特點〉，《辭書研究》2005年第3期，頁151-157。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語言文字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頁59-64。蘇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漢字文化》2010年第4期，頁94-96。韓文娟：〈從說「口」看白川靜的「說文觀」述評〉，《產業與科技論壇》2016年第15卷第4期，頁1-4。連登崗：〈白川靜「神聖漢字說」的失誤（一）〉，《中國文字研究》2017年第1期，頁174-175。

## 貳、《說文新義》與《字統》的編纂理念及撰著特色

### 一、《說文新義》的編纂要旨及目的

《說文新義》出版於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至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間，全書共十六冊，包括十四卷的本文篇、一卷通論篇及資料索引，其後收入《白川靜著作集》別卷，共計八冊。《說文新義》部分說法因收入《金文詁林補》及《金文詁林附錄》，故流傳較廣，評價也較高。白冰認為這是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的文字學著作，同時也是利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校補《說文》的力作。<sup>7</sup>也有人主張這部著作代表當時日本漢學界《說文》研究的最高峰。<sup>8</sup>

《說文新義》的編纂主要受到甲骨、金文等新材料出土之影響，撼動了《說文解字》歷來的權威地位，這使白川靜對文字研究產生重大疑問，故其提出「如何處理古代文字資料與文字學的關係」以及「古代文字學的方法及目的究竟為何」兩個問題。

在白川靜之前，文字學研究方法之反思已見於唐蘭、孫海波、馬敘倫等學者的研究。例如，唐蘭《中國文字學》比較漢字與世界其他文字體系，並談論文字的發生、構成、演化、變革等問題，彰顯「漢字研究傳統如何現代化」的問題意識。<sup>9</sup>與此同時，日本漢學家也重新思考古代文字學研究的方法與目的，尤其在高田宗周等前輩學者的餘緒之下，如何利用新出材料與傳統《說文》學中尋求平衡，更是當時漢字研究者共同的關懷。

白川靜認為隨著甲骨金文學的發展，文字學將從歷來所謂小學、《說文》學的範疇中開拓新的領域。因此，其主張運用新材料理解文字學理論體系，再從文化史的角度進行理解。<sup>10</sup>《說文新義》正是以此定位及確立研究方法，其立基於《說文解字》，利用新材料對歷來《說文》學、文字學的研究進行蒐集、概括及批判，再通過這些批判展開個人的解釋。換句話說，《說文新義》之所以「新」的關鍵，在於利用新材料提供的不同視角，從文化角度重新理解漢字的構成。

雖然《說文新義》特別彰顯出土材料為漢字研究提供的豐富內涵，但不是以否定《說文》的學術傳統為寫作目的。白川靜主要希望達成兩個意義：第一，藉由對漢字起源的研究恢復遺失的古代精神世界，建立以精神史為主的古代社會。第二，以現代科學方法拓展中國古典研究的範疇，利用科學考古的甲、金文印證

<sup>7</sup> 白冰：《青銅器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頁107。

<sup>8</sup> 朱順隆、何立民：《中國古文字學基礎》（復旦大學文博系列教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131-133。

<sup>9</sup>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說文新義8》（東京：平凡社，2002年），頁256。

<sup>10</sup>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說文新義8》，頁112。

《詩》、《書》典籍內容。<sup>11</sup>事實上，《說文新義》仍承繼傳統《說文》學的撰著模式，並未跳脫中國文字研究的範疇。

儘管如此，白川靜仍期許《說文新義》在文字學史上的意義，不只是一部日本漢學家研究《說文》的單純著作，而是將能將文字學研究從專注於對《說文解字》內容、體例、版本或背景的討論中解放，將文字的討論及思考，提升至整個中國上古史、文化史方面的認識。故《說文新義》與其說是一部利用新出材料校補《說文解字》的研究著作，毋寧是一部通過漢字研究，整理漢字和文化問題的著作。

## 二、《字統》的編纂要旨及目的

《字統》的釋字內容雖與《說文新義》多有重複，但兩者的編纂動機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因此體例及論述方式也有所差異，以下針對《字統》的編纂要旨與目的進行說明。

白川靜對《字統》的性質曾明確定位，指出該書是通過討論漢字構造，辨明文字初形與初義的「字源的字書」，同時也是考察字義發展及分化過程的「語史的字書」。此外，更是一部藉由語史的發展，嘗試觸碰漢字文化史問題的「漢字文化的研究書」。要言之，這本書就是涉及漢字的源頭、發展及文化三個層次問題一部著作。

該書包含許多白川靜對漢字的理解和認識。白川靜於《字統》序言云：「這本書，為了它明確的出發點，首先從字源的研究著手。文字的研究，經常需要系統的、整體的去掌握，因此為了這個明確的目標，我將這本書命名為『字統』。」<sup>12</sup>據此可知，《字統》的寫作基點就是字源學，其展現白川靜對於漢字字源的理解，故應從字源學角度審視該書的價值與意義。從方法論之，白川靜認為字形學包含字源學的研究，而若欲進行字源研究，就必須利用最古老的文字材料。<sup>13</sup>因此，《字統》的文字說解體例，多是先援引小篆、甲、金文材料，並以六書分類之，其後分析字形並說解字義。絕大部分的內容延續《說文新義》，唯《字統》提出更多作者個人獨到的創見，並將這些看法放置《說文》的解釋之前。

除此之外，《字統》與一般漢字字源著作的最大差異，在於突破中文字書依漢字形、音、義為分類標準的思考邏輯，按日本五十音排列。因為日本漢字的發音，是配合日語語音，必然與漢字原音不同。<sup>14</sup>白川靜剝離漢字與原音，再依照日語重新排列的做法，勢必對文字排列產生不同的視野。例如，《字訓》雖以日

<sup>11</sup>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說文新義8》，頁278-279。

<sup>12</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148-149。

<sup>13</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105。

<sup>14</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91。

語訓讀為排列依據，其發音較接近漢字原因，但仍有巨大落差，故セイ條下以耕部的成、生、正、聲等字，也有脂部的西字、月部的制字等。<sup>15</sup>又如，在コウ條下，按筆畫多寡依序排列：口、工、亢、公、勾、宏、孔、功……等字，其中「亢」和「伉」發音雖同為「コウ」，卻因為筆畫關係而相隔遙遠。此種排列邏輯從中文讀者的角度觀之，除日語發音相同之外，實難以看出字形或字義之間的連結，可見《字統》顯然是一本服務日語使用者的漢字字書。甚至從收錄円、零等和制漢字的角度觀之，<sup>16</sup>《字統》可說是一本整理「日本漢字」的字書。

除此之外，在《字統》一書中，白川靜嘗試建構系列字的概念，並認為這對於理解全體文字是較方便適宜的。<sup>17</sup>所謂「系列字」，是將文字分為載書、占卜、巫祝、宗廟、祭祀、裸鬯、聖器、神梯、聖域、生子、文身、盟誓、修禊、聖火、儀器、呪器、刑罰、獄訟、徒隸、死葬……等不同屬性，而這些不同類別的系列字彼此不僅相通，每個字還能藉由形和義和其他系列產生關聯，以此確立文字間的綜橫關係。<sup>18</sup>然而白川靜的系列字研究，遭到日本、中國不少文字學者的抨擊，畢竟從漢字發展角度觀之，系列字無論是分類或字形解說確實存在不小瑕疵，更有不少昧於字形發展強作解釋或連結之處。

不過白川靜撰寫《字統》的終極目的，無非是希望日本人正視漢字在其語言與文化中的重要位置。其曾云：「我們在歷史文化的脈絡下看待漢字，並且認可將漢字用於表示日語，而其意義就與國字沒有區別，這兩點是本書最重要的綱領。」<sup>19</sup>這段話旨在聯繫漢字與日語間的關係，若考慮到白川靜所處之歷史背景，則需要從另一種眼光討論《字統》，其很有可能是在日本社會呼籲廢除漢字的前提下，為日本人如何看待漢字所提出的作品。

## 參、《說文新義》及《字統》之釋字差異

《說文新義》與《字統》是兩部內容相承，但定位迥異之著作。為更清楚瞭解白川靜針對此二著作所採取的編輯策略，茲舉數例，觀察其釋字差異，並歸納出幾個主要具體特色。

### 一、釋字說解順序不同

<sup>15</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東京：平凡社，2004年），頁510-511。

<sup>16</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55、224。

<sup>17</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139。

<sup>18</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140。

<sup>19</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91。

由於《字統》吸收不少《說文新義》的既有成果，故兩書釋字內容相同者亦不罕見，然說解文字的編排上卻有先後次序之不同，可呈現白川靜對兩書定位之差異。

例如：法（灋）字見於兩書，《說文新義》的解說順序是先引《說文》之說，其次引林義光《文源》說解，其三列舉金文所見之「灋」，強調多通假為「廢」，最後才羅列自己的看法。<sup>20</sup>《字統》則以日本常見之「法」為字頭，指出正字作「灋」。雖從《說文》从水从廌从去的會意之說，然說解則以作者新見為主，強調「去」上部的「大」是指敗訴者，下部「△」是神判時放置盟誓的器物之形。此盟誓因有虛偽，故取去其蓋，以示破棄之意。故白川靜認為「灋」之字形，就是敗訴者和被破棄的盟誓之器，隨著敗訴者提供的解廌投入水中。<sup>21</sup>其後則簡單提及《說文》說解或金文材料。

由於《字統》較《說文新義》強調白川靜的個人見解，當被說解之字彼此有關之時，亦會再三重申作者觀點。例如：「去」字是構成「灋」字的部件之一，故《字統》便再次強調「去」與「灋」的關係，並認為「去」是象徵神判失敗之時，此人也被棄去。又說用水流去之字是「法」，被神判的解廌棄去是「灋」，《說文》形義全非。<sup>22</sup>事實上，「去」的字義鮮少與「法（灋）」有關，「法（灋）」字从「去」乃是標明「盍」聲，而此說涉及專業的古音古字問題，故白川靜為了方便讀者記住構形較為奇特的「法（灋）」字，從而連接「去」與「法（灋）」之義。

此外，白川靜對「去」字的六書歸屬與《說文》不同。其於《說文新義》的說解，是先引《說文》形聲說，後引《說文通訓定聲》象形說，並比較孫詒讓、商承柞等學者說法。強調卜文的「去」字从大从口，金文則未見此字。基本仍從學者說明及出土材料兩方面，質疑《說文》釋「去」為形聲的說法。最後才略為提及其看法，認為「去」的原義是展示罪科修祓、汙穢廢棄的原始古代禮儀，並非單純的遠去之義。<sup>23</sup>但在《字統》則標明「去」為从大从△的會意字，大是手足張立之人的正面形，△是蓋在外的盟誓之器。<sup>24</sup>

由「法（灋）」、「去」的例子可以看出，兩書的說解內容大同小異，然從《說文新義》的說解排序，可以看出《說文解字》的說法仍是主要辨析對象，而《文源》、金文材料或是白川靜的個人見解，都是為辨明《說文》而存在。至於《字統》則將作者見解置於前，《說文》說解或出土材料置於後，顯然欲令讀者先吸收作者意見，再參酌其他材料。

<sup>20</sup> 白川靜：《說文新義》（神戶：白鶴美術館，1985年），頁2017-2021。

<sup>21</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815。

<sup>22</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187。

<sup>23</sup> 白川靜：《說文新義》，頁1014。

<sup>24</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187。

## 二、《字統》與《說文新義》對系列字的強調程度不同

「系列字」是白川靜漢字研究的一大特色，亦是獲最多研究者討論之處。在《說文新義》與《字統》兩部著作中，可以看到其「系列字」學說的發展過程及重視程度。例如：「辛」字是鼻辜類的字頭，白川靜以此字為基本字形，認為像墨形用之大針，串聯許多相關之字。然在《說文新義》中僅簡單聯繫辛和墨刑之間的關係，刑罰方面聯繫童、妾等字，紋身方面則聯繫文、彥、爽等字，並引鼻辜關係字說供讀者參考。<sup>25</sup>而《字統》對「辛」字的說解卻頗為不同，作者指出此字用於紋身，故从辛之字甚多，更直接批判《說文》「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之說未得原始構形要領。最後以辛為基本字形，系聯章、言、童、妾、鼻、辜等字，認為這些字皆與直針、紋身、墨刑有關。<sup>26</sup>由此看出，《字統》明顯較《說文新義》更強調白川靜的「系列字」之說，甚至以作者說法取代《說文》解釋。

從漢字教育的角度看來，「系列字」或許可以幫助一般讀者記住形體相似但意義不同之漢字。唯《字統》是按照日語發音排序，故形體相似的系列字多半被打散至各處，不如《說文新義》按照部首編排容易查找，因此在《字統》漢字說解中可以發現作者反覆重申系列字在意義與構形方面的關聯，而此種現象是在《說文新義》所未得見的。

以「聿」系諸字的書、肅、聿、聿、畫、畫、律等字的說解來看。「聿」乃此系列字的字頭，白川靜認為「聿」从筆形與手，手持筆之意。又連繫「建」與「畫」，認為前者乃筆立於中廷表設計之意，後者乃表周（方形的盾）上有筆施於文彩之意。<sup>27</sup>而此說解又與「畫」字相呼應，指出「聿乃筆，田乃周之初形。周乃方形之盾。方形之盾施以彩畫，画則為略字……畫之原義乃施以彩飾之盾。」<sup>28</sup>又如：「肅」在《字統》被解釋為从聿从規之形。聿乃筆，規乃畫圓之用具。白川靜認為「肅」乃筆和規畫出紋樣使器物神聖化，因此衍生出肅敬、肅慎、嚴肅之意。其更指出《說文》「持事振敬，从聿在肅上，戰戰兢兢也」的解釋，是對「肅」字的錯誤分析，認為此字下部並非肅形，亦非以筆臨肅。最後，更從古代的文樣聖化方法來看，認為肅、畫乃系統之字。<sup>29</sup>由是可見，只要讀者掌握「聿」為手持筆之形，就能推知其他从「聿」之字的原義。

若詳細從系列字比較《說文新義》與《字統》，可以發現白川靜於後者更堅持個人觀點，亦更勇於提出新說。例如：「書」字在《說文新義》基本延續《說

<sup>25</sup> 白川靜：《說文新義》，頁 2971。

<sup>26</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485。

<sup>27</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28。

<sup>28</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85。

<sup>29</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433。

文》从聿者聲之說。但是對於《說文·敍》云：「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並不認同，認為說解和訓義不同。其個人觀點主要來自出土材料，其從金文字形推斷「者」字乃以叉枝遮掩祝告，使祝禱產生效用。又認為「書」見於金滕，所謂金匱或石室之書，或起源於隱藏的詛咒祝冊。書乃聿加祝告之書，即所謂載書。<sup>30</sup>雖然白川靜此時試圖提出不同的分析意見，但並未全盤否定《說文》看法。而在《字統》卻已將「書」解釋為从聿从著的會意字，認為聿是筆，者是埋在土中包含祝禱之器，在其上用樹枝和土掩蓋之形，象徵包圍聚落周邊的土居、土壘，為堵的初文，從而反對《說文》從書、著疊韻，主張「者」為聲符的形聲說。<sup>31</sup>

此種以特定字頭串連系列字的作法，在《字統》不時可見，有時亦使說解顯得過分牽強，難以理解。例如：「聿」字在《說文新義》仍根據《說文》「聿飾也」之說，認為和紋身有關，主張多是紋飾之形。<sup>32</sup>不過在《字統》卻有極其不同之說，白川靜要受到《說文》釋「蠱，氣液也」的影響，認為「聿」乃手持細針之形，「彡」乃針刺後流出的液體之形，故「聿」乃氣液流淌之形，津潤之意，為「津」之初形。<sup>33</sup>又如：「皃」字，《說文》云：「傷痛也。从血聿，皃聲。」《說文新義》主要質疑「皃」不但與「蠱」聲不合，從此字構形也很難理解何以產生傷痛之意，故白川靜認為「皃」乃入墨之紋樣，「蠱」乃指入墨後上加聿形，下加受血之器皿。乃指入墨時的傷痛。<sup>34</sup>此說尚且試圖連結《說文》說法的漏洞與不合理之處，但在《字統》中卻直言，「聿」乃手持辛之形。以刺皮膚，入墨。「皃」像婦人之雙乳，如同「奩」與「爽」乃婦人乳房加以文身之形，身分高貴之婦人，下葬時塗以禁咒的硃砂。<sup>35</sup>

由「聿」和「蠱」兩例可以看出，白川靜在《說文新義》仍受到《說文》不少影響，即便提出個人觀點，其目的也多是企圖解釋《說文》說法的不合理之處。然於《字統》則相對強調「系列字」的關聯性，努力嵌合「聿」和「蠱」的字義與紋身相關儀式，因此出現「彡，乃針刺後流出的液體之形」或是「皃」像婦人之雙乳，此種背離文字發展邏輯且令人難以理解的說法。

### 三、對日本自造漢字的關注程度不同

由於《字統》的預設讀者為日文使用者，故其與《說文新義》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收入日本漢字。這些漢字未見於中文世界，多是在日語使用環境下被創造而出，故不具備漢語發音，有時也不符合文字發展脈絡，然在《字統》的編纂邏輯

<sup>30</sup> 白川靜：《說文新義》，頁 595-596。

<sup>31</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85。

<sup>32</sup> 白川靜：《說文新義》，頁 595。

<sup>33</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85。

<sup>34</sup> 白川靜：《說文新義》，頁 1017-1018。

<sup>35</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215。



下仍與其他字並列字頭。

例如：「畑」字未見於中文，且歸部非中文邏輯的火部，而歸田部。《字統》釋此字从火从田。乃相對於水田的火田之意。古代日本火耕作廣泛盛行，故多見以燒草開墾的陸田。《日本紀私記·神代·上》「為陸田種子」之陸田，故製作此字，而在中國以火田稱之，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見「人納火田租」之句。<sup>36</sup>

又如：「杵」字在《字統》中直接標註「國字」，即日本漢字。因為此字中文作「箕」，隻聲。《說文》云：「所以收絲者也。」是一種捲絲線的工具。然在日本漢字中，是取箕之字音讀為「わく」，字形則「杵」，「杵」未見於中文，最早在江戶後期的小說「滑稽本」可見，然其字源不明。<sup>37</sup>

再如：「雫」字，《字統》分析為从雨从下。《龍龕手鑑》「奴寡·奴寬之二反」即ダ・ダン之音，然未見說解字義。中國古代的字書亦未見，在日本實際出現者乃在《萬葉集》中，但仍以「しづく」表示，雫之字未見。<sup>38</sup>

上述「畑」、「杵」、「雫」三個日本漢字分別呈現與中文的不同關係。「畑」字的火田之義中文亦見，但多直接以「火田」稱之，並不似日本為此事專造一字。此可能與民族生活環境不同有關，因古代日本的火耕較為盛行，故針對此事另造一字。至於「杵」字的情況較為複雜，因中文亦有表示同樣意思的「箕」，而日語亦受「箕」字發音影響，可見此字早期應有傳入日本，唯不知為何，日文並未採用中文的「箕」字，而是另外創造「杵」字來表示。最後的「雫」字是純粹的日本漢字，中文並未對「水滴」單獨造字，而從《字統》說明可知古代日本亦無漢字表示此意思，應是後來創造之字，與中文毫無關係。由此可見，《字統》是一本定位明確的著作，其作為一部提供給日本讀者漢字知識的字書，必須討論中文未見的日本漢字，並分析解釋以方便學習，而此部分正是《說文新義》毋須處理之課題，亦是兩者差異最顯著之處。

## 肆、白川靜漢字研究的反省與檢討

### 一、白川靜漢字研究相關檢討

關於白川靜的漢字研究，中、日兩國都有不少檢討文章，大致可分為三種立場：

第一種立場是屬於強烈批判者，如東京大學教授加藤常賢、藤堂明保等人，他們以日本漢字字源研究權威的身分，批評白川靜的漢字研究「證據不足」、「未

<sup>36</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720。

<sup>37</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961。

<sup>38</sup> 白川靜：《新訂字統》，頁 581。

能參考《說文解字》，而白川靜也不甘示弱地回應，雙方甚至引發過論戰。<sup>39</sup>持類似立場的尚有劉海宇，其於〈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批評白川靜過多地將純粹的文字符號看成「圖象」或「圖畫」，並以此方法來考釋一些古文文字，把很多的後起形聲字當作複雜的會意字，把它們看成一幅幅的圖像，產生翩翩的聯想。<sup>40</sup>這種將文字符號的圖像化理解導致會意字的範圍過於廣泛，把一些非常簡單的形聲字解釋為複雜的會意字。<sup>41</sup>其碩士論文《白川靜《字統》「載書」文字學的譯介與研究》基本也是延續此立場，對「載書」理論提出較強烈的批判。這類學者大致認為白川靜的漢字研究存在許多與現實脫節之問題，對於理解漢字結構或演變而言，並不具備參考價值，甚至容易形成閱讀者錯誤或混亂的認識。

相對於前面的批判聲浪，亦見學者大力讚揚白川靜的漢字研究，此為第二種立場。例如，蘇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著眼於日本戰後社會產生的漢字廢止爭論，肯定白川靜從分析漢字構成原理一途，幫助日本人記憶漢字的方法。其更主張白川靜的漢字研究是通過對《說文解字》批判和修正而發展起來的學說，相較許多人對《說文》仍保持無條件的崇信，白川靜對《說文》抱持懷疑的態度，予以甄別修正，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方法。<sup>42</sup>

較為特別的是，蘇冰肯定白川靜從民俗學解釋漢字的創新途徑，甚至反過來批評許慎《說文解字》是「帶著漢儒的有色眼鏡」，操持現實主義，而忽略上古的祝咒文化與巫術活動。<sup>43</sup>其亦相信白川靜利用日本傳統習俗或禮儀以解釋中國上古社會的研究途徑，並認為這些日本古代的風俗禮儀器物正可作為殷商古俗古禮的借鏡，如此更能夠一定程度地復原消逝全無的歷史，解讀甲骨文、金文時遇到的難題也會登然而解。<sup>44</sup>此種全面肯定白川靜漢字研究的論點，過去較少得見，儘管蘇冰強調白川靜所處的時代背景，對其學說抱持同情的理解，然而其漢字研究是否如同文章所言，對恢復歷史、解讀甲骨文產生如此巨大的正面效應，顯然未能取得共識。

第三種立場則較為持平，對白川靜的漢字研究部分肯定，亦有部分否定，而持此立場者多為日本學者。例如，落合淳思就肯定白川靜從字形角度討論漢字起源，比起加藤氏、藤堂氏從字音角度討論來得合理，但也認為白川靜過分強調民俗學，從會意角度思考漢字，忽略了聲符在文字裡的重要性。<sup>45</sup>主要集中在對日本人學習漢字的貢獻。清水真哉指出，日本人對於記憶漢字的困難之處，在於對

<sup>39</sup>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の問題点〉，《神戸大學大學院人間發達環境學研究科研究紀要》6:1 (2012.09)，頁 41-42。

<sup>40</sup> 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頁 64。

<sup>41</sup> 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頁 64。

<sup>42</sup> 蘇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漢字文化》2010 年第 4 期，頁 94。

<sup>43</sup> 蘇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頁 96。

<sup>44</sup> 蘇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頁 96。

<sup>45</sup> 落合淳思：《漢字の成り立—說文解字から最先端の研究まで》（東京：筑摩書房，2014 年），頁 93-194。

學習者而言，不容易理解漢字字符與意義的關聯，尤其是新字符產生時，若未能查看舊字符，便無法理解漢字來源，從而導致漢字學習的困難。<sup>46</sup>而白川靜的漢字字源研究，正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困難，故《字統》相關字出版後，不僅獲得日本社會的高度關注，亦對漢字教育現場產生影響。<sup>47</sup>

除此之外，田畑曉生也從實用價值來看白川靜的「字源說」。其認為對日本人而言，日本中學生通過此種解說，較容易親近漢字的形音義，也變得容易記憶。畢竟象形文字有些造型十分相近，不易辨別；會意文字有些分解部件後的意義不易了解。形聲文字則須了解其音符與字音的關係，而很多發音是從漢字音得來的，並非生活常見的日語，至於會意形聲文字，更需從意義與聲音兩方面推定。若現代日本人按照傳統方法認識漢字，可能必須先記住中國古代音韻，才能記住漢字，此種學習方式根本本末倒置。<sup>48</sup>

由是觀之，白川靜的漢字學說確實對日本社會大眾學習漢字產生較好地影響。尤其是協助中小學生記憶漢字、親近漢字，並引發社會大眾對漢字的認同，從而抵抗當時興起的漢字廢止論。然而，清水氏與田畑氏並非一味肯定白川靜的漢字學說，對其論述的缺陷與過度之處亦有清楚認識。田畑曉生即直接表明，白川靜的漢字學說僅僅停留於「假說」，而非真實的狀況。<sup>49</sup>

二位學者所言甚有見地，白川靜的漢字學說從內容與效應兩方面論之，有其複雜性。若從《說文解字》以降的傳統文字學審視，其說解或分析漢字的結論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尤其是昧於文例通讀及結構演變等現實情形，逕自從神異或祭祀的角度說解，容易使讀者留下錯誤的印象。然從日本社會大眾學習漢字的角度觀之，此種說解漢字的方法，確實較能引發普羅大眾的學習動機，方便記憶，因此不再視學習漢字為畏途。不難發現，白川靜漢字學說的評價之所以正反兩極，多來自於不同立場的視角，並非全面地關照，而本文認為若欲提出較客觀的論證，仍需回歸白川靜的核心關懷，並以此檢視其研究途徑與目的。

## 二、文字學的出路與東洋的圖景

在《說文新義》附錄〈文字學的課題〉一文中，白川靜意識到新出土的甲骨、金文材料將對傳統文字學研究帶來新的變革。儘管在當時，研究者對於古代文字學的研究發展仍有各式想像，但對白川靜而言，其研究目的就是期望通過古代文字的形象和構造，辨明古代的精神世界。<sup>50</sup>這樣的目的，在其論著中呈現兩個鮮

<sup>46</sup> 清水真哉：〈白川靜の漢字学と漢字学习への影響〉，《齒科學報》116:2（2016.2），頁96。

<sup>47</sup> 清水真哉：〈白川靜の漢字学と漢字学习への影響〉，頁97。

<sup>48</sup>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の問題点〉，頁42-43。

<sup>49</sup>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の問題点〉，頁42。

<sup>50</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82。

明的面向，首先是對回復東洋的關心，其次則是對漢字教育的努力。

無論是白川靜本人或其他日本學者都曾明確指出，其學術的核心關懷就是「東洋」。白川靜認為若想回復已經失卻的東洋圖景，就必須親近東洋的古代，唯有通過文字和文字的表現，才能求得回復東洋之道。<sup>51</sup>然而何謂「東洋」？清水真哉進一步指出，白川靜的意圖是從歷史的角度辨析東洋及東亞，對白川靜而言，東洋就是共有漢字的文化圈。<sup>52</sup>由此可知，白川靜乃是將漢字研究視為一種方法，通過此方法追尋自己對東洋的想望。

既然漢字研究是追尋東洋的方法，則白川靜的漢字研究便與其他學者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事實上，日本學界對於漢字起源的關心並不亞於中文學界，在白川靜以前已有不少關於漢字字源的討論。例如，昭和 41 年出版的長澤規矩也《新漢和中辭典》就引《說文解字》為主要論述字源之依據。又如，較著名的漢字字源研究者藤堂明保、加藤常賢等人，也吸收當時音韻學及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強調字音關係，提出「單語家族」學說。然如前所述，這些學者對於白川靜的漢字研究頗不以為然。對白川靜而言，漢字是東洋共有的遺產，則說解漢字就不必然只從中文或中國歷史思維出發，漢字背後所保留的古代社會痕跡，應當是漢字文化圈所能共同理解、認識的內涵。

以此論之，白川靜的漢字學研究當如清水真哉所言，其視漢字為中國文字，也是日本漢字，這種從比較文化或比較文化看待漢字的觀念，最終體現於漢字的字源字典《字統》以及獨特的日本古語辭典《字訓》二書之中。<sup>53</sup>換言之，白川靜並非進行單純的中國文字學研究，而是試圖將中國文字提升至漢字文化圈的高度，結合社會、歷史及文化，探究文化圈背後共有的東洋精神。

白川靜的漢字研究發展，正可從《說文新義》及《字統》兩部著作之異同清楚看出。儘管《說文新義》仍是以《說文解字》為主要分析對象，然引用甲骨、金文材料以及當代學者說法的方式，已經展現白川靜欲檢討傳統文字學研究方法之意向。更甚者，從前文列舉字例的說解可看出，其將個人見解放置於後的做法，也是企圖逐步呈現終極的研究目標，即古代精神世界的認識。

撰寫《說文新義》時，白川靜亦已注意到漢字與日語之間的關係，並對日本教育中的國字政策頗有微詞，然未於該書處理。及至撰寫三部字書，方從日語及日本教育的角度處理漢字問題。尤其在〈字統的編輯〉一文中，其明確指出《字統》選用了日本語的漢字發音作為排列順序，表明在這本書中的「文字」，是以日本漢字的立場被解釋，而非中國文字。<sup>54</sup>並指出這些日本漢字並不是單純挪用中國文字來紀錄日語聲音，而是包括了歷史文化的內涵。<sup>55</sup>《字統》正是在此二

<sup>51</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 31。

<sup>52</sup> 清水真哉：〈白川靜の漢字学と漢字学习への影響〉，頁 94。

<sup>53</sup> 清水真哉：〈白川靜の漢字学と漢字学习への影響〉，頁 94。

<sup>54</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 91。

<sup>55</sup> 白川靜：《製作字書》，頁 91。

前提下編輯而成的字書。

換言之，《說文新義》與《字統》呈現相當不同的編輯思維，尤其在看待「漢字」的立場更是判然有別。《說文新義》旨在以新出土的文字資料辯證《說文解字》的內容，除引用當時重要文字學者的看法外，間或提出白川靜的個人見解。儘管作者試圖反省傳統《說文》學的研究方向，但該書仍應視為日本漢學家的中國文字研究成果。至於《字統》雖然沿用大量《說文新義》之成果，不過在撰著體例或讀者取向方面，都是以日語使用者為預設對象，因此《字統》可以說是分析日本漢字的讀物，其目的乃是希望日本社會大眾藉此瞭解漢字、認識漢字，並不是以說解中國文字為目的的字書。

以此觀之，本文認為從《說文新義》到《字統》的轉變，應可視為白川靜從中國文字學到漢字學的研究成果。若以此檢視則不難發現《說文新義》是白川靜試圖以新出土材料擺脫傳統《說文》學的研究方法，而《字統》則是其脫離中國文字學之範疇，而是從漢字文化圈的角度進行思考，服務於日語使用者的成果。因此，本文認為從白川靜的研究發展來看，其已非純粹的中國文字學研究，而是以漢字為方法，追尋東洋圖景的漢字學研究。

## 伍、結語

本文通過比較《說文新義》與《字統》兩部著作的編纂理念、撰著特色以及釋字差異，可以窺見白川靜從文字學到漢字學的研究發展。進一步言，此發展過程實與白川靜的學術核心關懷息息相關，因此從「東洋」角度看待白川靜的文字說解，將有以下三個面向的收穫：

第一，《說文新義》並非單純以新出土資料解釋古文字的著作。白川靜在撰著《說文新義》時已思考過文字學的研究方法與目的。在甲骨、金文開始大量出土的二十世紀初期，無論中國或日本都在反思文字學的研究方式，並試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故白川靜很快地選擇吸收新出土資料，作為解釋文字的方法。在其所見，此方法只是通往其研究目的的理想途徑，而其研究目的乃是恢復最初的東洋精神。

第二，從文字學到漢字學研究。既然白川靜的學術核心關懷為「東洋」，則其所解釋的「文字」，便不是單純的中國文字，而是在漢字文化圈底下各個社會大眾所使用的「漢字」。為服務這群漢字使用者，白川靜設計了方便日本人的說解文字之書—《字統》。儘管《字統》與《說文新義》內容大量重複，然而在編纂方式與說解文字方面，仍為了讀者進行調整，同時視被說解之文字為日本社會的漢字，而非中國文字。

第三，白川靜對日本社會的漢字教育。若從「東洋」或「漢字」角度觀之，則白川靜許多背離事實的漢字說解，或可從不同眼光看待。過去已有不少日本學

者提及，白川靜的漢字說解對於中小學漢字教育的方便之處。儘管從學術研究的眼光來看，其說解確實存在明顯缺失，不過若能釐清其撰著目的，或許更能同情地理解其研究成果。

綜上所論，本文認為從《說文新義》到《字統》的發展，可窺見白川靜漢字學研究之成形。過往對其進行批判之說法，究其所論，多從中國文字學研究角度觀之。然從東亞漢字學研究角度重新審視，則或可解釋白川靜之所以受到日本社會大眾高度推崇的原因，亦可對其研究成果有新視野以及不同評價。

## 參考文獻

### 近人專著

- 白 冰：《青銅器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
- 白川靜：〈我的履歷書〉，《回思九十年》（東京：平凡社，2011年）。
-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東京：平凡社，2002年）。
- 白川靜：《製作字書》（東京：平凡社，2011年）。
- 白川靜：《說文新義》（神戶：白鶴美術館，1985年）。
- 白川靜：《新訂字統》（東京：平凡社，2004年）。
- 朱順隆、何立民：《中國古文字學基礎》（復旦大學文博系列教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
- 落合淳思：《漢字の成り立—說文解字から最先端の研究まで》（東京：筑摩書房，2014年）。
- 劉海宇：《白川靜《字統》「載書」文字學的譯介與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 期刊論文

- 林 源：〈《字統》的體例和特點〉，《辭書研究》2005年第3期，頁151-157。
- 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語言文字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頁59-64。
- 蘇 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漢字文化》2010年第4期，頁94-96。
- 韓文娟：〈從說「口」看白川靜的「說文觀」述評〉，《產業與科技論壇》2016年第15卷第4期，頁1-4。
- 連登崗：〈白川靜「神聖漢字說」的失誤（一）〉，《中國文字研究》2017年第1期，頁174-175。
-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の問題点〉，《神戸大學大學院人間發達環境學研究科研究紀要》6:1（2012.09），頁37-45。
- 清水真哉：〈白川靜の漢字学と漢字学習への影響〉，《齒科學報》116:2（2016.2），頁93-98。